

王夫之与“心学”渊源——王夫之知行观浅析

胡诗雨

贵阳学院 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 贵州贵阳 550005

摘 要: 王夫之发挥了明德为心说,但其所认为的“心”同朱子有所区别。他不反对朱子以明德为心,但强调明德之为心,是本心、心体之心,而非有着善恶之分的经验之心。本文查阅王夫之相关文献,对于王夫之心学,即知行观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述了作为首先冲破封建束缚,发扬辩证法精神的哲学家王夫之是如何成长、接触、发展心学,从知行关系的先后、难易方面进行讨论。

关键词: 王夫之心学;知行观;王阳明

一、王夫之心学理论与知行观

王夫之从“天德良知”批判阳明“致良知”与“心即理”从“无不善之谓良”批判王学“以无善无恶为良知”在《传习录下》中,阳明曾对钱德洪与王汝中阐明心学教义,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的是格物”,并且表示:“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王夫之有着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和理学、心学都格格不入,对待世界的哲学和顾炎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首先他反对理学中的灭人欲,认为欲望才是人进步的阶梯,空谈天理是违反人伦的,其次,王夫之认为心学当中的天理在人心也不实际,客观理论知识是后天学习得来的。

王夫之将前人的知行关系进行了归纳与批判以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独到的知行观,他以“知行相分”为前提,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又引孔圣人的一句话“仁者先难而后获”,认为二者相较行比知更加难以执行,所以要将行放在知以前,其学说对于知行先后和轻重作了详细的回答,进而发展成较为完备的哲学体系。对于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认为知应该重于行,有了高深的知才能更好地行,对于这一点,王夫之抱持着反对的态度,认为过多的将重心放在“知”上,会导致世人忽视“行”,进而只会构建虚无的幻想中的社会。哲学家王阳明也对程朱理学的知行关系表示反对,但又并非全然否定,进行了相当一部分的采纳,例如其思想核心部分的知行合一中的知是指格人的内心,认为心外无物,这样的知并不是以人的道德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可以说是另一种纸上谈兵。王夫之大为批判前两者的思想,

不论是程朱理学的重“知”而轻“行”,还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都是一种在幻境中筑梦的行为,脱离了现实,否认了躬行实践的重要性,长此以往下去,社会将会沦为空有理论没有实践的空中楼阁^[1]。

在知行分合的问题上,王夫之亦给出了见解。前面说到,程朱重知,认为应当先博学、审问,然后才是实践的笃行,明显能够感觉到此学派将知与行几乎割裂的呈现出来,将两个范畴的间距推得更为遥远,王阳明对此也表示反对,因为终身不行只会造成终身不知。程朱对于知行的关系也不是完全的隔断,但是着重强调了行对于知的依赖性^[7],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又过于将知行关系联和得太紧密,导致其界限模糊,让人容易混为一谈。王夫之将二者的不足之处都表达了出来,他并非两个党派的其中一派,而是从自己“躬行实践”的观点出发,对二者的知行关系的解读做了去粗取精的改良。王夫之隔岸观火,看到了知行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作用的过程,提到了知行新理论“相资互用”,也就是俗称的辩证法,知与行并非完全同一,也并非完全分离,而是一众互相渗透的作用关系,这一观点的提出,使得被程朱和王阳明的思想影响了百年的文人都开始思考二者的新关系。行可以兼知,但知不可以兼行,知是行的伴随属性,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一定是行,二者对立又统一。王夫之超前的观点的关键之处是他看到了世界的发展是永不停歇的向前,而处在社会中的人必然也应该跟随着不断发展变化。

王夫之的知行关系,之所以认为知来自于行,在不断深化的发展中,知又反作用于行,这便是辩证法的雏形,来源于彼此的矛盾,是“知行相资以为用”。王阳明

所强调的知行合一之所以不够先进,因为没有考虑到事物需要前进发展,知行合一后,便是致良知,少了在道德实践上的贯彻落实,过于注重过程而轻视结果,恐导致虚无主义。但需要注意,王夫之虽然思想先进,但不可避免的会染上那个时代的特征,也就是唯心主义的色彩。致知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心与耳目口鼻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将人的感官与精神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和“圣同庸”一致,五官是主体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在获取知识的途中,无法与耳声目色割裂开来。这一点在王夫之看来,又有知识获取途道的问题,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是来源于不同的途径,而每个人对于二者的区分又有自己的尺度,这样一来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唯心主义。但王夫之亦给出了解决方案,就是可以将格物与致知当作两种方法来使用,既有行,亦有知^[5]。

王夫之的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包括理欲关系、知行关系、学思关系等方面观点,在提出真知灼见的同时,他对于理学教育方面有着较为深刻的批判,这同他“知”与“行”相统一的思想息息相关。例如王夫之主张的关于人性的观点,“旧生则日成”、“继善成性”的结果,这是他后天经历而成,并不是先天的观点。他认为“习性”在个人发展和日常学习中占比极大,影响力很大。

总的来说,尽管王夫之的知行理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但他的行和今天的社会实践并非同一个物体,而是作为个人的社会交往的道德规则,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环境的基础上,王夫之的知行观还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理论的多以小我、自我为主,而不是近现代关于劳动人民的争取阶级利益的斗争。

二、王夫之心学的影响

在宋明理学家的理论里,道德修养与认识论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谈的,知也并非指今时今日对于真理或生活的认知,而是对于社会伦理与内心道德的认知,是对先验或超验天理的体认,是三纲五常里关于君臣或父子等的礼与义^[3],中国古代以来研究哲学的通常是士大夫一族,他们常常会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过度理想化,缺发对于现实社会的关照,在封建礼制社会属于道德理想主义者,宏大的文化变革将在他们当中产生,试图重建一个理想的道德价值体系,扶正不善的社会风气与伦理道德。

孟母三迁的道理是人容易被所处环境所影响,同样的,我们今时今日的生活是过去每一个时代都无法想象

到的,遇到的困难与挑战亦是前所未有的,哲学形成于当代人类的思想凝练,必然带着时代性的烙印与文化的渗透,各个时代对于真理的“真”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西方一位哲人曾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嗤之以鼻的古人的不够完善的哲学思想,何尝不是一种傲慢,这样的态度实不利于对历史准确性与客观性的考察与描述,更不利于中国哲学在今后的发展。

王夫之所提出的知行观是在程朱与王阳明之后,既是几位哲学家观点的总结与发展,也是批评与指正,他先行发现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强调知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正因二者有区别,才谈得上相互作用,这已经是唯物辩证法的雏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被宋明道学观点束缚许久的对于知行观点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可能性,毫无疑问的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8]。

“时代造英雄”或许能很好的形容王夫之的人生境遇,关于王夫之的评价,后人有褒奖,亦有指责,但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就是王夫之对于心学的发展有着超前的思想和跨时代的意义,能够造成一时的思想界的轰动^[9],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代文人的思想基调,亦或是截然相反的激烈碰撞,抛开时代争论是与非毫无意义,起码他独到的见解是鼓舞到了一些对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抱着消极心态的文人志士的。在宋明道学横行的发展中,王夫之思想的出现为中国哲学注入了新鲜血液,让一潭死水的思想界又活跃起来,文人们在王夫之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的影响之下,见到了黎明的曙光与全新的出路。他运用辩证法的观念,在思想发展有局限的时代,将“知”与“行”的配合再次赋予新的诠释与融合,竭尽客观的讨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这一举措为知行观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10]。

王夫之抱持着挑战当道盛行的权威哲学思想,这样敢于质疑的无畏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提倡的勇敢,新的时代的到来的转折点总是从怀疑开始的,而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也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夯实的基础与实践先端,这是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王夫之的知行观直到现代仍然影响深远,但无人能想到,这样一个超前的心学理论在当代是鲜有人能理解并接受的,由于封建社会的特殊人文环境以及清代文字狱的影响,使得王夫之不得不沉寂在朝堂之外完成著述,而后来才大放异彩的学术思想开端也是埋没于一时。近现代的谭嗣同与章太炎等著名的能人志士与革命

领军人物就是被王夫之的知行观所影响的,谭嗣同^[12]作为被王夫之哲学思想影响深远的几大人物之一,对于知行观有着特别的看法,他在知行关系中更倚重“知”的作用,这使得他在做领袖人物时判断有失偏颇,盲目而偏执地认为“贵知不贵行”,没有发动起人民群众的力量,个人力量过于单薄,思想也过于理想化无法落地,最后革命失败。辛亥革命领导者孙中山也颇受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影响,但他的观点与谭嗣同背道而驰,他则是认为“知难行易”,真正知道真理是艰难的,更甚于行动,有着提出了“能知必能行”和“不知亦能行”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便是他对王船山的朴素唯物辩证法知行论与实际相结合后的产物,更加完备、科学,为中国社会发展开辟了新的更加合适的道路。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应当知晓,王夫之的知行理论中蕴含了道德行为与道德践履,在这一维度看来,王夫之的思想是非常超前先进的,对于当代的道德建设有着非凡的启迪意义。他引《尚书说命》的两句话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又引孔子的一句“仁者先难而后获”,经过现代社会不断的发展与完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求身体力行^[1]。

我国当代教育的主要方向也是知与行的统一,“力行然后知之真”,王夫之认为实践(力行)是为了更好的“知”,也就是说,“知”是“力行”的目的,“力行”又是“知”的获取途径,这观念同社会发展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尤其是具有实用主义和专业性质的教育类型,例如某烹饪学校、幼师职业技术教育等等培养的学生就业的目的就是为社会培训专业人才,相比普通大学里的泛学目的性较强,这样出来的技术人员也更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而王夫之还在教学中强调“教必著行”,所学的知识要能运用在实际中才算是达到教学目的。王夫之的知行观也与当代的社会教育需求息息相关,他的知、行统一,和“教必著行”的思想折射出了我国当代教育的主流方向。

总的来说,王夫之的知行理论是对于程朱和王守仁知行观的去糟粕而取精华,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建设有着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范江涛.王夫之知行观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J].山东电大学报,2000(2):3
- [2] 夏青.浅谈王夫之的知行观[D].河北大学,2010.
- [3] 乔桂珍.论王夫之的知行观[J].今古文创,2020(21):2.
- [4] 路高丹.王船山知行观研究[D].郑州大学.
- [5] 万光军,高腾云.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论王夫之的知行观[J].泰安师专学报,2002,24(5):4.
- [6] 丁为祥.宋明理学的三种知行观[J].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9,36(3):1.
- [7] 刘瑞琳.试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重在其“行”[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53-59.
- [8] 张锡勤,关健英.从中国古代的知行学说论及德育的内涵[J].道德与文明,2012(5):5.
- [9] 王建平,黄明喜.吐故纳新:陶行知对王阳明知行观的继承与发展[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2(4):7.
- [10] 朱良钰.道德视域中的王阳明知行观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8.
- [11] 冯琳[1].王船山与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J].王学研究,2019(1):17.
- [12] 侯勇.王阳明“知行观”的当代德育价值[J].四川教育,2021,000(005):12-14.
- [13] 宁新昌.从“心性论”到“理本论”——朱熹哲学思想轨迹探寻[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10.
- [14] 王锬.“天地以生物为心”——朱熹哲学的“生本论”[J].哲学研究,2006(2):5.
- [15] 陈来.朱熹哲学的“心统性情”说[J].浙江学刊,1986(6):4.
- [16] 乐爱国,陈昊.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中的日本影响[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69(6):8.